# 体认符号学视域下典籍核心概念的表意融译英释新探

刘　羽,黎泽萍

**摘　要**:融通世界、传达中国,始于译文之信达,成于传播之致远。面对典籍核心概念在英语世界常被简化或误读的困境,本文提出“表意融译”(Integrative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作为回应。该策略以汉语“字本位”为基点,承继表意文字法的形义阐释思路,将体认符号学化为典籍核心概念跨文化阐释的具体操作路径。以“道”“德”二字为例,示范“表意融译”的具体阐释路径,并通过实证研究初步验证其传播有效性,为典籍核心概念国际传播提供一种兼顾文化忠实性与阐释效度的新思路。

**关键词**:表意融译;国际传播;汉字表意性;体认符号学;核心概念英释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26)03-0093-07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26.03.015

## Integrative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Core Concepts in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Semiotics

LIU Yu　LI Zeping

**Abstract**: Engaging the world and communicating China are rooted in the fidelity of translation and realized through the efficacy of dissemin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oversimplification and misreading of core concepts from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tegrative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is proposed. Grounded in the sinogram-based theory, this strategy draws on the form-meaning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to ideograms, operationalizing embodied-cognitive semiotics a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core concepts. Taking “*Dao*” and “*De*” as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elaborates the specific interpretative procedures of this strategy and empirically validates its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thereby offering a new approach that balances cultural fidelity with interpretation effec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ore concepts from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integrative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deographicity of sinogram; embodied-cognitive semiotics; English interpretation of core concepts

## 1. 引言

随着文明互鉴日益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已成为国家战略与学术前沿的交汇点。中华文化的体系是由术语组成的,术语的理解和翻译,对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和局部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潘文国 2017:142)。赵新雷(2025:14)指出,本土翻译理论应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核心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建立文化理解的通识代码(蓝红军 2026:133)。

汉语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字形构义蕴含丰富文化信息。然而,现有中国文化核心概念英译研究多聚焦译词选择、语义对应与哲学阐释,对汉字表意性在翻译中的作用及其实现路径缺乏系统讨论。

鉴于此,本文提出“表意融译”翻译阐释策略,以汉字本体性为立足点,吸收表意文字法的形义阐释思路,以体认符号学为理论依据,将汉字表意性转化为跨文化阐释资源,为典籍核心概念国际传播探索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新路径。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中华典籍英译及国际传播表意融译研究”(24JD054)。
**作者简介**:刘羽,中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黎泽萍(通讯作者),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 2. 理论基础

“表意融译”的中国典籍核心概念翻译阐释策略植根于汉语语言学界对汉语本体特征的长期探索。近代以来,中国语法研究逐步实现由西方理论借鉴向本土理论自觉的转向。1898 年,《马氏文通》开启了汉语语法的现代研究历程,但其“词类本位”框架难以充分解释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的特点。此后,黎锦熙提出“句本位”,朱德熙倡导“词组本位”,邢福义构建“小句中枢说”,均在不同程度上突破西方语法范式的限制。其中,徐通锵首次提出“字本位”理论,从根本上挑战了以“词”为中心的印欧语分析模式。他明确指出:“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而非印欧语系的‘词’”(徐通锵 1994:11)。潘文国(2006:44)指出,“字”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最小结构单位,是理解汉语构造与运用的核心。这一从“模仿”到“自觉”的学术转向,本质上是对汉语独特性的再发现。汉字具有文化编码性,其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申小龙、孟华 2014:57)。“字本位”确立了汉字的本体地位,也由此引发思考:如何在文化传播中彰显汉语特质与中国元素?汉字表意性对典籍外译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仍有待深入探究。

将汉字构形分析融入翻译并非全新的尝试。Amy Lowell 与 Florence Ayscough 在《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1921)中即对此有所探索。意象主义诗人 Ezra Pound 则进一步将汉字构形与诗歌意义生成联系起来,经其整理出版的 Fenollosa 遗稿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并成为其表意文字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此书前言中,Pound 指出:“独特性会带来创造的灵感”(“the exotic was always a means of fructification”)(Fenollosa & Pound 1936:3)。这里所说的“独特性”主要对应汉字的表意性。Fenollosa 将汉字描述为“大自然的生动写照”(“a vivid shorthand picture of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认为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总结经验而形成了文字,文字被视为自然的暗示(natural suggestion)(Fenollosa & Pound 1936: 8)。Pound (2010:21)表示,“汉字并非单纯的声音符号,而是具有图画性质的表意符号”(“Chinese ideogram does not try to be the picture of a sound, or to be a written sign recalling a sound, but it is still the picture of a thing”)。在他看来,表意文字法既是创作和研究诗文的正确方法,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实现儒家“正名”的主张,解决西方危机的手段(王坤 2024:96)。但表意文字法因缺乏系统理论体系支撑,在实践中难以摆脱译者主观直觉(李勇 2020:147),其阐释可靠性受到质疑。

体认符号学为这一诉求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符号学以索绪尔的二元符号观和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观为重要理论源流,分别强调符号的结构关系与意义生成过程。与此同时,语言学历经了从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到体认语言学的范式转型,语言意义研究逐渐将身体经验、感知活动与认知加工纳入考察。据此,王寅(2014:61)主张将“认知语言学”修正为“体认语言学”,以“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的协同作用阐释语言现象。符号学的二元、三元传统与语言学的体认转向由此在理论脉络上实现交汇。在此基础上,王铭玉、康喆文(2021:1)提出“体认符号学”,从符码体认、符喻体认、符间体认、符化体认和符域体认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这五个维度分别关注符号编码、隐喻机制、符号互构、经验符号化及符号意义在文化语境中的生成与重构,为典籍核心概念的跨文化阐释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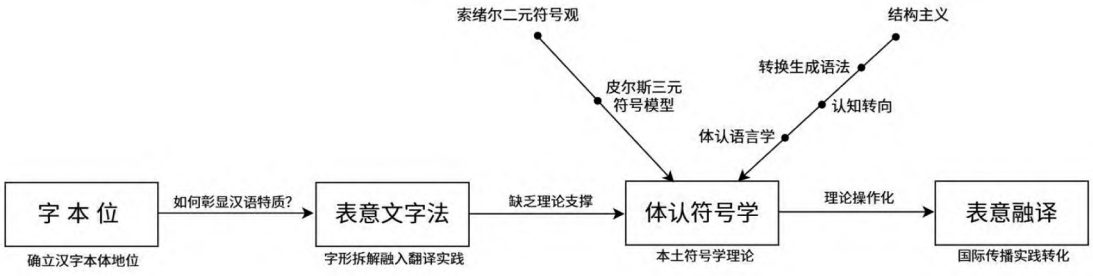



图 1.“表意融译”理论建构

“表意融译”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建构历经三重奠基(如图 1):“字本位”确立汉字本体地位,为汉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语特质的彰显提供本体依据;表意文字法承此脉络,将字形拆解融入翻译实践,开启实践先声;体认符号学则融合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之说,构建起本土符号学理论,赋予表意文字法以理论自觉。“表意融译”则是这一理论谱系在典籍翻译阐释领域的具体转化与操作化落地。

### 3. 内涵界定与操作路径

典籍核心概念内涵丰富,可谓典籍翻译中的最大挑战(郭丽娜 2026:48)。目前,学界对于典籍核心概念的英译尝试包括意译(Legge 1971)、音译(杨平 2008)及音译加注策略(张政、胡文潇 2015)、哲学比较阐释翻译(Ames & Hall 2001)以及创造性新词翻译(蔡新乐 2020)等路径。这些探索在推动中华典籍海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意义阐释上多借助西方既有的话语体系与理论范畴。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强化翻译学的本体意识与自主意识(刘军平 2025:89)。而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更能彰显中国翻译理论的文化根基与理论主体性(冯全功 2026:102)。

鉴于此,“表意融译”应运而生,将其界定为一种以汉字表意性为阐释资源、以意义重构为核心、以跨文化传播为导向,并以体认符号学五维框架为理论支撑的翻译阐释策略。该策略并非在汉字字形与英语词汇之间寻求形式对应,而是将字形及其构件所提示的意义线索,与概念关联、认知意象和文化语境相结合,引导目标语读者由汉字形式进入概念意义,在意义重构中把握概念背后的文化生成逻辑,即由“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

“表意融译”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理论资源的本土化、意义阐释的立体化和传播路径的主体化三个方面:一是以体认符号学为理论支撑,将汉字表意性转化为概念阐释的本土理论资源;二是突破单一语义对译,融合字形、认知及文化维度,实现核心概念的多维重构;三是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与理解为导向,将文化意义的传递由译者单向释义转向读者参与意义建构,从而增强典籍核心概念的跨文化可理解性。

在此基础上,体认符号学五维框架被转化为“表意融译”的操作路径(表 1)。该路径包含符码、符喻、符间、符化与符域五个维度,依次对应字形拆解、认知隐喻、概念网络、语义演变及文化定位,共同构成一套层层递进的跨文化阐释体系。下文将以“道、德”二字为例,具体说明这一理论框架在典籍核心概念翻译中的实践应用。

表 1. “表意融译”五维阐释框架

| 体认维度 | 具体操作 | 解释 |
|---|---|---|
| 符码 | 字形拆解 | 拆解汉字构形部件,提取文化阐释价值 |
| 符喻 | 认知隐喻 | 借隐喻唤共通经验,搭跨文化理解桥梁 |
| 符间 | 概念网络 | 关联相邻典籍概念,呈现语义动态互构 |
| 符化 | 语义演变 | 梳理语义演变轨迹,显现由象及理层级 |
| 符域 | 文化定位 | 纳入历史典籍语境,阐明整体文化定位 |

### 4. “表意融译”的翻译实践

#### 4.1 “道”的表意融译

“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其语义随着历史语境、思想流派及书写载体的演变而持续生成与重构。陈晞、蒋骁华(2022:1)将“道”的英译历程概括为从神学化到哲学化再到多元化的演变:早期以带有基督教色彩的“vervbum”(至高之神的语言)为代表;后译为“逻各斯”(logos)开启了哲学化解读;随后衍生出如“上帝”(God)、“自然”(Nature)、“宇宙法则”(Principle)、“道路”(Way)以及音译“Tao/Dao”等多种译法。上述译法的多元化表明,“道”难以通过单一英语词汇实现充分的概念对应,其意义生成具有超越词汇层面的复杂性。因此,“表意融译”阐释策略旨在回到汉字本身,从字形及其所承载的认知、概念和文化线索入手,重构“道”的意义生成路径。

为追溯“道”字表意线索,依据相关文字学资料,梳理“道”字的主要字形演变阶段(如表 2 所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字形虽然在书写形态上有所变化,但其构形所呈现的意义线索为进一步开展符码层面的阐释提供了文字学基础。以“道”字构形为起点,“表意融译”五维阐释路径由此展开。

表 2. “道”的字形演变

|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楷书 |
|---|---|---|---|
|  | | | |

符码层面,楷书“道”字由“辶”与“首”两个构件组成,二者共同构成该字的物质符码基础。“辶”与行走、道路相关,提示运动、行进和历程等意义;“首”本指头部,可进一步联想到方向、引领与思虑。二者组合所呈现的“头部引领脚步、循方向而行”的具身场景,构成“道”相关抽象意义生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重要感知基础。

符喻层面,以“首”“辶”二构件所呈现的具身经验为源域,可提炼出“道即自然运行之道”(道 as Natural Course)的认知隐喻。循方向行走的身体经验被投射至宇宙万物自有其运行轨迹与内在秩序的抽象领域,由此,“行走”不再只是物理位移,而成为理解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认知路径。

符间层面,“道”并非孤立概念,而是在与其他核心概念的关联网络中获得具体而完整的意义。以孔子思想为例,“道”与“仁、礼、孝悌”等概念形成紧密的意义关联:“仁”体现价值内核,“礼”体现行为规范,“孝悌”则构成伦理实践的重要起点。这些概念共同构成“道”的儒家意义网络,使其成为贯通价值、规范与实践的伦理范畴。

符化层面,“道”的意义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由经验到哲学的历史演变。“道”的原初意义与“道路”“路径”相关,随后逐步扩展为事物运行的内在原理,并在先秦哲学语境中进一步发展为关于万物本源、运行规律及宇宙秩序的重要哲学范畴。这一演变表明,“道”所承载的意义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持续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

符域层面,经由前四维意义的层层积淀,“道”的意义最终被置于中华文明关于方向、秩序与实践统一的整体文化语境之中。其文化定位可概括为“Direction Aligned with Order(DAO)”,强调“道”不仅关乎行动所遵循的方向,也关乎主体在行动中体认秩序、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行道”因而不仅是身体在物理路径上的移动,更意味着主体通过思虑、实践与体悟,将抽象智慧转化为具体的生命经验。由此,“道”从一个具有具象构形的汉字,逐渐成为承载中国哲学世界观与实践智慧的核心文化符号。

表 3. “道”的“表意融译”阐释

| 体认维度 | 具体操作 | 解释 |
|---|---|---|
| 符码 | 字形拆解 | 辶:movement, journey or progression<br>首:“head”, implying direction |
| 符喻 | 认知隐喻 | Natural Course |
| 符间 | 概念网络 | 道 is the ethical path of benevolence, ritual and filial piety |
| 符化 | 语义演变 | “road” or “path” extending into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things, the origin of all existence, and universal truths |
| 符域 | 文化定位 | Direction Aligned with Order (DAO) |
| 整体阐释 | | To “walk the Way” is to turn wisdom into lived understanding through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

综上,“道”字由字形之“首”“辶”到隐喻之“自然之径”,由概念关联的伦理网络到历时演变中的意义抽象,最终汇聚于“方向与秩序”的文化定位,五个维度共同构成一条由字形、认知、概念、历时到文化的意义生成链条。基于“表意融译”,“道”翻译阐释为:“To ‘walk the Way’ is to turn wisdom into lived understanding through reflection and practice”。这一阐释通过“首”与“辶”的构形关联,将思虑与行动、认知与实践联系起来,突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由此,汉字表意性成为连接字形、认知经验、哲学概念与文化意义的重要阐释资源,具体阐释内容见表 3。

4.2 “德”的表意融译

“德”的出现早于“道”,是把握中国哲学整体结构的重要概念(孙熙国、肖雁 2012:61)。韩志华(2018:56)将“德”的英译策略归纳为三类:一是语义替代,如“virtue”“excellence”等单一词汇;二是添加新词,如“De”“Teh”,虽能保留原概念但需大量注释;三是“分而译之”,根据具体语境采用不同译法。这些译法分别从语境义、概念义或文化独特性等方面回应了“德”的翻译需求,但总体上仍较难呈现“德”由外在行为、内在心性到社会伦理逐层生成的意义逻辑。同样,依循体认符号学五维框架,对“德”展开“表意融译”阐释。而“德”的字形经演变(如表 4 所示)为符码层面的构件分析提供文字学依据,也为符化层面的历时意义考察提供重要线索。

表 4. “德”的字形演变

|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楷书 |
|---|---|---|---|
|  | | | |

符码层面,楷书“德”字由“彳”“十”“目”“一”“心”五个构件组成,共同构成该字的物质符码基础。“彳”与道路、行走相关,可唤起移动、践行和举止等具身经验;“十”意为众多,“目”取象于眼睛,关联观看、辨察与见证,可相互合观,徐锴注“十目所见,是直也[①]”,即以“十目”喻“众目”,指众人目光之共同注视;“一”意为专一、统一,可与“心”合观,喻指“一心”,即心志专一不二;“心”象心脏之形,在传统认知中又与意念、情志和内在意识相关。五个构件相互联系,形成“十目所视、一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心所守”的具身意象。

符喻层面,以构件所呈现的具身经验为源域,可提炼出“德即内在光辉”(德 as Inner Radiance)的认知隐喻。美好的道德恰如人内心所散发的光芒,光芒源自内部却自然外显。德性亦然,真正的美德并非刻意彰显于外,而是发于内心之真诚,自然流露于言行举止之间,如光辉般照亮四方、为众目所共睹。由外在“十目所视”之“直”,到内在之“诚”,再由内在心性落实于具体行动,“德”由此形成了由身体经验通向道德认知的隐喻映射。

符间层面,“德”的深层意蕴正是在与“仁”“礼”“道”等核心范畴的互动网络中得以确立与彰显。在儒家思想中,“德”是为政之本、社会和谐之基。“为政以德”揭示出“德”在治理层面的根本地位。唯有为政者品德高尚,方能感召人心,上行下效,进而实现社会之和谐有序。可见,“德”之意涵并非止于个体修身,而是经由“修身—为政—治国”这一关联链条,并与仁爱、礼制、治理、人心和社会和谐等概念形成相互关联的意义网络。

符化层面,“德”的意义呈现出由外在行为向内在心性、再向普遍伦理原则逐步扩展的历时演变轨迹。早期“德”的意义线索更多与行走、行止和行为规范相关,强调主体在现实行动中遵循正道并保持端正。随着“心”这一构件在字形中的明确呈现,其意义又获得了更为突出的内在心性维度,使外在“行”与内在“心”形成关联。进入后世思想语境后,“德”进一步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抽象为稳定的道德品格,并逐渐发展为涵盖个体修身、社会伦理和政治治理的普遍性伦理范畴。

符域层面,经由前四维意义的层层积淀,“德”最终被安顿于中华文明“Daily Ethics(DE)”的整体文化语境之中。“德”并非悬置于形而上领域的抽象教条,而是落实于视、听、言、行等日常实践之中,通过个体对自身行为和内心状态的持续省察,将道德原则转化为可感、可行的生活实践。与此同时,个体的修身又能够向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延展,使“德”由个人的内在修养逐步关联至社会关系与公共秩序。

综上,“德”字由字形之“彳”“十”“目”“一”“心”到隐喻之“内在光辉”,由关联之“修身—为政—治国”到演变之由外而内的内化跃迁,最终汇归于“日常道德规范”的文明定位,构成一条完整的意义生成链条。基于“表意融译”,“德”翻译阐释为:“To walk uprightly with a sincere heart”。这一表达将字形构件所蕴涵的行动、正直与内在心性加以整合,使目标语读者能够从汉字构形进入概念意义,并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由修身而达于社会和谐的实践逻辑。其具体阐释内容见表 5。

表 5. “德”的“表意融译”阐释

| 体认维度 | 具体操作 | 解释 |
|---|---|---|
| 符码 | 字形拆解 | 彳:movement, journey or conduct<br>十:many, numerous, glossed as “numerous eyes”(十目)<br>目:eye, to observe<br>一:one, unity, wholeheartedness<br>心:heart, intention and conscience |
| 符喻 | 认知隐喻 | Inner Radiance |
| 符间 | 概念网络 | 德 i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and social harmony |
| 符化 | 语义演变 | eye looking straight ahead while walking, extending into internalized moral integrity and further into universal ethical character |
| 符域 | 文化定位 | Daily Ethics (DE) |
| 整体阐释 | | To walk uprightly with a sincere heart. |

4.3 “道”与“德”

上文“道”“德”进行了表意融译阐释。然而,在汉语实际运用中,二字又常联结为“道德”这一固定词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整体阐释方式。Pound(1968)较早运用表意文字法深入汉字构形内部,对“道”“德”分别进行释译(如表 6 所示)。

表 6. “道”“德”的表意文字法释译

| | |
|---|---|
| 道 | The process. Footprints and the foot carrying the head; the head conducting the feet, an orderly movement under lead of the intelligence (Pound 1968:22). |
| 德 | What results, i. e., the action resultant from this straight gaze into the heart. The “know thyself” carried into action. Said action also serving to clarify the self knowledge (Pound 1968:21). |

Pound 的尝试虽开启了从构形理解中国概念的先河,强调“道”的“行走与引导”及“德”的“直视与行动”,但仍将二者视为相对独立的概念,未充分揭示其共有的具身场景与意义关联。

若回溯至甲骨文阶段,这一内在关联便可得到更为直观的印证。“道”“德”二字甲骨文均以“”为构形起点,表明二字本就置身于同一场景之中。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象四达之衢,人所行也。[②]”“道”字由“”与“人”组成,描绘人立于岔路、行走其间之形,呈现的是“行走之人”。“德”字同样以“”起笔,右部为一目加一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竖,象征目不斜视、直视前方,呈现的是“行走之态”应有的端正专注。由此可见,二字共用“十字路口”这一意象,“道”强调“行于何处、如何前行”,而“德”侧重“行走之时应持何种姿态”。这一共同的行动经验,构成了二者意义关联的认知基础。

基于此,“道德”可被理解为“行于其道”与“持守其德”的统一:由“知其道”确立方向,由“践其德”端正心性。在国际传播中,除保留功能性译名“morality”外,建议借助甲骨文构形图解补充阐释二者的具身关联。通过“表意融译”,为目标语读者提供进入概念内部结构的认知路径,使其从单纯的“知晓译名”进阶为“理解思想”。

### 5. 可理解性评估

为初步考察“表意融译”翻译阐释策略在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可理解性及传播潜力,本研究以某985高校77名国际留学生为对象(实验组42人,对照组35人),对比考察“表意融译”阐释路径与常规翻译方式在概念理解、情感参与和主动传播意愿三个维度上的差异[③]。受访者总体处于汉语学习初级至中级阶段,多数学习汉语4个月至1年、HSK水平集中在2~3级,且约七成受访者此前未接触儒家文化相关概念。两组受访者在地域分布、学习年限、HSK水平及文化认知基础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 > 0.05$)。

表7. 三项测量维度的结果分布

| | | 实验组 | 对照组 |
|---|---|---|---|
| 概念理解 | 基本 | 15(35.7%) | 31(88.6%) |
| | 深层 | 27(64.3%) | 4(11.4%) |
| 情感参与 | 积极 | 40(95.2%) | 27(77.1%) |
| | 消极 | 2(4.8%) | 8(22.9%) |
| 主动传播意愿 | 积极 | 42(100%) | 29(82.9%) |
| | 消极 | 0 | 6(17.1%) |

如表7所示,两组受访者在概念理解、情感参与和主动传播意愿三个维度上均呈现出一定差异。在概念理解维度上,两组受访者的概念理解深度存在显著差异(Fisher exact test:$p < 0.001$,$\varphi \approx 0.54$)。实验组受访者更倾向于结合字形构件及其意义关联形成较为具体和富有联想性的解释。例如,有受访者将“德”表述为“walking on the road with eye and heart”,表明其能够结合字形对概念意义重新阐释。相比之下,对照组的回答更多停留于词义对应和释义复述层面,如将“道”直接理解为“the way”。这表明“表意融译”更有助于引导受访者突破简单的词汇对应,进入概念意义的自主建构,为深化中国经典核心概念的跨文化理解提供了初步实证依据。

在情感参与维度上,两组受访者的积极反馈比例亦呈现显著差异(Fisher exact test:$p < 0.05$,$\varphi \approx 0.27$)。实验组多数受访者在反馈中主动表达了希望延续或深化相关学习的意愿,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学习兴趣和情感参与。有受访者表示:“I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classes or outdoor visits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lassical concepts of hanzi”;也有受访者提出:“I hope we can learn more philosophy”;还有受访者表达了持续学习古代汉语的愿望:“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studying ancient Chinese”;更有受访者期待相关活动再次开展:“I hope it will come again”。这些反馈表明,“表意融译”不仅能够激发受访者的即时兴趣,也增强了受访者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中国经典文化的意愿。

在主动传播意愿维度上,两组受访者的积极意愿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isher exact test,$p < 0.01$,$\varphi \approx 0.32$)。实验组全体受访者(100%)均给予了积极评价,多数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向他人推荐。例如,有受访者表示:“I would recommend to all my friends”;另有受访者称:“I will highly recommend to my friends who are interested”;还有受访者表达了更为积极的推荐意愿:“I strongly urge my friends”。部分受访者则从方法的学习效果出发予以肯定,如“yes, it explains vividly how to remember and how to write”以及“very effective, easy to learn characters”。可见,实验组受访者表现出较强的主动传播意愿,表明“表意融译”在促进文化内容分享和激发受众传播意愿方面具有优势。从国际传播视角看,主动传播意愿意味着文化传播由“接受”进一步延伸至“再传播”。受访者在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主动分享相关内容,有助于推动文化传播由单向传递向受众参与和二次传播延伸,借助社会交往网络扩大中国经典文化的传播范围,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互动性与持续性。

综上,实证结果表明,“表意融译”在促进核心概念理解、增强文化兴趣和激发主动传播意愿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优势,为其应用于中国典籍核心概念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初步支持。

### 6. 结语

典籍核心概念的国际传播亟需立足自身特色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资源,探索本土化的阐释路径。“表意融译”的价值正在于打通本土理论资源、汉字知识资源与国际传播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文字所蕴含的知识资源转化为跨文化阐释资源。由此,典籍核心概念的国际传播不再单纯依附于既有的西方概念范畴,而能以中华文明自身的语言、概念与认知方式,作为意义阐释的起点与依据。唯有持续推动中华文明自身的语言资源、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转化为具有解释力、传播力的学术话语,才能真正推动核心概念阐释从“以西释中”向“中西互释”的深层转型,进而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供新的理论支点。

**注释:**

① 转引自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267.

② 转引自许慎. 说文解字[M]. 汤可敬,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8,卷四:404。

③ 相关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另文详述。

## 参考文献


[1] Ames, R. T. & D. L. Hall. *Focusing the Familiar: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2] Fenollosa, E. & E. Pound.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M].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36.

[3] Legge, J. *Confuciu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1.

[4] Pound, E. *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 The Unwobbling Pivot*[M]. London: Peter Owen, 1968.

[5] Pound, E. *ABC of Reading*[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0.

[6] 蔡新乐.《论语》之中:“仁”的英汉译解原理简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2):69-83, 149.

[7] 陈　晞, 蒋骁华. “道”不同,亦相为谋——基于语料库的第一个《庄子》英译本中“道”的翻译[J]. 外语与翻译, 2022(1):1-7, 98.

[8] 冯全功.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概念辨析、现状评析与拓展探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6(2):101-106.

[9] 郭丽娜. 从翻译典籍到典籍翻译:关系与展望[J]. 外语与翻译, 2026(1):43-50.

[10] 韩志华.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德”与 virtue 对译研究——兼论“多元一体翻译法”[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48-57, 192-193.

[11] 蓝红军. 中国文化核心概念外译传播研究:论域与方法[J]. 英语研究, 2026(1):130-140.

[12] 李　勇. 西方作家对汉字的创造性误用——以谢阁兰和庞德为例[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3):146-153, 256.

[13] 刘军平. 当前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六大趋势及其局限性[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5(1):84-89.

[14] 潘文国. “字本位”理论的哲学思考[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6(3):36-45.

[15] 潘文国. 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5):141-147, 177.

[16] 申小龙, 孟　华. 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再汉字化[J]. 西部学刊, 2014(2):57-60.

[17] 孙熙国, 肖　雁. “德”的本义及其伦理和哲学意蕴的确立[J]. 理论学刊, 2012(8):61-67, 127-128.

[18] 王　坤. 从“视觉形象”到“精确定义”——庞德《诗经》英译中的两种表意解读[J]. 中国翻译, 2024(1):95-101.

[19] 王铭玉, 康喆文. 后现代体验人本视域下的符号体认观[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2):1-8, 158.

[20] 王　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2014(6):61-67.

[21] 徐通锵. “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兼评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J]. 世界汉语教学, 1994(3):1-14.

[22] 杨　平.《论语》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2):61-63.

[23] 张　政, 胡文潇.《论语》中“天”的英译探析——兼论其对中国文化核心关键词英译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15(6):92-96.

[24] 赵新雷. 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国际传播:困境与出路[J]. 上海翻译, 2025(5):13-18.


责任编校　　罗逸文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